

【名家阅读】

# 《乡土中国》六十年杂话

□陈心想

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尤其偏爱《乡土中国》以及《皇权与绅权》里的几篇文章。《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4月,是费孝通1946年将乡村社会学整理出的讲稿,而且是他第二期的工作,对社会结构作分析。

以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远大抱负,这本书不会只是写给学生看的,也不只是给学术界的同行看的。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又爆发了,不管是抗战战后,还是内战战后,都有个战后重建家园的问题。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姊妹篇《乡土重建》可以看出,他是在为重建国家而谋划。作为一个书生,他必须让更多的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了解他的思想和谋划,才可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费孝通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乡土中国》,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然后出版了《乡土重建》,开始在理论上谋划重建措施。难怪英文版译者称该书文章也可以在政治文件的层面上来理解。

但是,时事风云变幻,后来的事实证明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努力和抱负只能在政治的海洋里被淹没了。历史走向了一个他没有预测到的轨道: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试验代替了他谋划的乡土中国的重建。费孝通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路子。要在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乡村工业,而不是通过阶级斗

争摧毁传统,建立新社会。

当然,历史无法重来,假如我们真的采用了费孝通的重建蓝图,后来中国的发展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乡土中国》确实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难得的一本著作。中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不可绕开这本书。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本书只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部分情况,绝对不是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完全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首先因为费孝通的乡村实际调查是很有局限性的。云南三村和江村都是一个地方的情况。正像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的第一篇里开头申明的:“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当做一种见解是可以的,而不能当做全部事实。比如当时乡村的土地革命,党派的斗争在乡村的表现以及乡村治理上的变化等等都没有在《乡土中国》里体现出来。这样说,并不是我们苛求费先生,而是提醒现在的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读者还要注意的重要一点就是《乡土中国》描述的至多只是中国的乡村,而没有包括城镇和城乡关系。在《乡土重建》里,费孝通确实写了几篇文章谈市镇以及城乡关系,但是远远不够。因为大家多看的是《乡土中国》,容易认为中国的图景就是

乡土性的。陈映芳先生在一篇《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里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了。结果,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一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既无益于我们的文化自觉,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在研究“三农”问题的时候,《乡土中国》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目,但是一定要反思和尊重现实情况。

在了解传统中国的近代变迁方面,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1903-1953)》是一本弥补《乡土中国》不足的好书。这本书对动乱、战争以及新兴的党派等对传统乡村的影响都有精彩的论述。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学人书架】

本期登场:熊森江



## 1.《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捷克]赫拉巴尔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部小说以一个餐厅服务员蒂迪尔的打工经历,半嘲讽半悲伤地呈现了捷克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变迁。精彩的情节和细节令人应接不暇,每一个细节都像是经过很精心的提炼,非常自然生动而富有表现力。小说后半部分描绘了捷克各阶层人士在纳粹时期的遭遇。捷克并不是一个辽阔的国家,但作者试图铺叙出这样的文义:大地、辽阔、捷克人的心灵。

## 2.《大数据》 涂子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叙述美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历史,素材很具说服力。数据开放关系到社会透明度、制度建设等宏大的社会问题,数据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公民获取基本权利的斗争进程。美国各公益组织和许多较真的个人一起蹚开了信息公开这条路,作者对此的描述着墨甚多。学习文科的读此书也许更容易被触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作者对人类文明进展的感想。

## 3.《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英]以赛亚·伯林 著 译林出版社

以赛亚·伯林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身世与文化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因此,他对苏联的访问注定是富于洞见的旅程。本书记叙了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会晤,整理了作者对苏联知识界和苏联文化的思考。

## 4.《巨流河》 齐邦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作者对家族与百年中国的记忆,没有渲染苦难,而是在苦难和颠沛流离中体悟生命与历史,文字深情而克制。许多人读罢多会感叹历史沧桑,对书中所述台湾融入世界的过程则留意不多。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费派遣大批学子求学海外,书中写了作者在美国异常勤奋的学习生活,而彼时的大陆则把知识和文明抛置一边,两相对照,令人叹惜:要培育文明,得花费数代人艰辛的努力;要毁坏文明,只需要一时的丧心病狂。

(本文作者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

【诗意盎然】

# 诗性的享受

□王佐良

诗怎样读,才能读出诗意?还有,什么才是好的诗评?这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王敖编译的《读诗的艺术》在我的手上已经快磨出茧子了,但我还是常常捧读,它告诉我很多读诗的奥秘。

过去读诗,拿起来就读,不管读懂了多少,反正读过去了,有的记住了,有的忘了,忘了的,就跟没读过一样。看了《读诗的艺术》我才明白,读诗,如果不去深究其中的奥秘,不去寻根问底地追踪字里行间的隐藏,不去了解诗人的生平 and 遭际种种,读了,等于没读,甚至比没读还糟,因为自以为懂了,其实是误解。特别是外国的诗。外国的诗人,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也比传记作者们塑造的奇妙得多,所以,不看外国注家的评析,很难读懂外国的诗。比如很多诗人喜欢使用典故,像艾略特,用典繁复而冷僻,他的《荒原》几乎行行有来源,在古典到现代之间跳跃,他自己的注释和翻译的注解加起来,比诗本身还要长。理查德·威尔伯说:“这种诗只属于塞满了历史的头脑,所以它对没有受过训练去读它的人毫无意义。”济慈擅长写自己眼前的境况和心情,要是不了解他写作时的状况,如肺结核引起的高烧和寒战不断交替侵袭他羸弱的躯体,就弄不明白他刚刚还在高唱“总是暖意融融,只等欢乐纵情”,怎么一下子变成“高烧不退的额头,焦渴的唇舌”,然后又冒出来“凉的田园诗”?这种曲折跌宕,难道跟希腊古瓮优美的外形有关?当然不是,而是跟诗人此时的肉体和精神状况密切相关。

此书所集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专业评论家,有的是诗人兼评论家,他们写的,那才是真正的批评,因为,文化底蕴相同,时代背景谙熟,更重要的,思维方式也大体一样。我特别欣赏肯尼斯·勃克解析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语言温和,分析透辟。还有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奥登,他写别人,别人也写他,这样的文章放在一起,可是大有看头。

英国也是诗的王国,自古诗人辈出,巨星耀眼,很多著名的诗人已被人们研究了几百年,新成果层出不穷,因年久日深,人们的钻研更深入,评判也更挑剔,何况对人的评价应时而变,尤其是对诗人。过去默默无闻的,现在成为研究的热门,仿佛出土的文物,比如约翰·克莱尔,他跟荷尔德林同时代,遭遇也几乎一样,所不同的是,克莱尔没受过多少教育,是泥土中长出的天才诗人,就在他人到中年,诗情“伟大的喷发”之时,被强送精神病院,与他热爱的人和土地隔绝,他逃跑,又被抓回。他哀叹道:“我存在——可我是什么,没人关心/无人知道;/朋友弃我远去,像抛弃失去的/记忆……”可悲!古今中外有几个天才诗人是带着香茗,怡然自得地写诗?苏东坡在大醉中作“明月几时有”,艾略特在严重的精神崩溃之后写《荒原》,荷尔德林在精神失常之中创作“人类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杰作”(茨威格语)……两百年之后,人们出版克莱尔的诗集,谢默斯·希尼说:“克莱尔总是在为受害者欢呼,总是乐于站在柔弱和顺的一方,或者勇敢却孤立的一方……”美国诗评家海伦·文德勒却看中了克莱尔的生态意识,他的诗里“自然、人、思想、感情和形象编织出天衣无缝的整体……”还有特立独行的诗人菲利普·拉金,对英国社会极尽冷嘲热讽……看来,要读的诗很多,而且还要下力气读,哈罗德·布鲁姆说:“读诗的艺术是真正的扩展意识的训练。”

书中还说到西方诗的源头希腊。奥登在《希腊人和我们》一文中简评了希腊的诗歌,他认为,假如没有希腊文明,我们也许会畏惧上帝并善待邻人,也会进行艺术实践,甚至会设计比较简单的机器,但我们不会觉悟到自己是人……

看了这段话,可知奥登真的非同一般,他还是个哲学家。

当然,外国诗人写得再好,如果翻译不好,那也白搭。本书编译者对英语文学很有造诣,他的翻译堪称精品,用词贴切,语义明了,读起来顺畅自然,特别是英语诗的翻译,在我读过的作品中,可谓上乘,读这样的书是一种诗性的享受。

(本文作者为翻译家、山东大学教授)

【书与人生】

# 森林之子

□刘荣哲



他。到了半夜,大雪骤降,并刮起能把房盖掀掉,把树连根拔起的大风。大家震惊不已,他却泰然自若地抽起旱烟袋。

雨、洪水、吸血虫、沼泽、寒冷、冰雪都伤害不到他。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他和考察队队长被困在四面沼泽的小岛上,没有火种,也没有御寒的衣服。他拼命地割草,而且指导着哪里的草能割,哪里的草不能动。他把割下的草做成窝棚,把留下的草搓成绳,接上皮带和绳子,把窝棚牢牢揽住。大雪来了,把窝棚盖严,一丝寒风也透不进去,两人暖暖和和地在睡眠中躲过天灾。

最有趣的,是他把一切都看成“人”。他说野猪:“它的和人一个样,就是衣服不一样。骗人的会,生气的会,什么都会!”和人一个样。”他喝斥跟踪他们的老虎:“我们的走路,没有碍你的事。干吗你的后边走?难道林子里地方少吗?”居然把老虎给羞跑了。燃烧的木柴噼啪作响,火星乱飞,烧了被子,他咒骂木柴是“坏人”,“他的应该赶走”,起身把木柴扔到了河里。火上的茶壶吱吱叫,打扰了他们谈话,“怎么老叫!坏人!”跳起来,把滚热的水倒在地上。

考察队在荒野的窝棚里住了一宿,临走时,他用桦树皮把几根火柴、一把米、一撮盐包好,留在窝棚里。“别的什么人来,窝棚找到,干柴找到,火柴找到,吃的找到,不会死!”一群肥大的海狗在悬崖下的岸边休息,有人举枪要打,他制止了,因为打死海狗也搬不上来,白白开枪,不好,有罪。有人挖了一些捕鹿的陷

阱,没填平就离开了。马鹿、狍子等动物陷进去,被活活困死。他狠狠地咒骂那些人,带人把所有陷阱填平才离开。

他不在墓地附近放枪、砍树、采浆果和践踏草地,怕打扰死者的安宁。有人捉住了小飞鼠,被他放掉了,他认为小飞鼠是死孩子的灵魂,在大地上游荡一些时候,然后回到阴间去,而阴间就在太阳落下去的那边。

他有自己的思想。“沙皇的有,各种长官的有,红胡子的有。中国人也是这样:皇帝的有,红胡子的有。我们的怎样生活呢?沙皇的没有,长官的没有,红胡子也没有。”就是说,人有了等级之分,就有了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土匪;没有了等级,就没有人祸。有些中国道家味道。

这个人名叫德尔苏·乌扎拉,他曾陪伴的那支考察队队长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他写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他。这位考察队队长从1902年开始考察乌苏里地区,用这本书记录了那里的原始状态和风土人情。高尔基曾为这本书的表现力入迷、倾倒。日本导演黑泽明则把德尔苏·乌扎拉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在俄罗斯,德尔苏·乌扎拉被视为“森林之子”,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和象征,莫斯科有一个非官方的发展生态旅游基金会,就是以德尔苏·乌扎拉的名字命名的。然而,在作者去世之前,这个地区大部分原始处女林就已被烧光,机车轰鸣,出现了一座座俄国大村庄,森林和森林之子都绝迹了。